

面向马克思主义应用的维特根斯坦

菲鲁齐奥·罗西-兰迪

胡易容 译

无须追问哲学家的意义，理解他的运用：哲学家的意义正是他在文化中的运用。

一、《哲学研究》(Untersuchungen)的主显节

1953年5月1日，我与来到牛津的很多人一样在期待中醒来，吃完早餐后我急不可耐地跑到巴兹尔·布莱克维尔出版社所在的大街上等它开门。正如此前公布的消息所言，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第一批《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正光彩熠熠地躺在橱窗里。暗蓝色的包裹布衬托着它们严谨朴素的内容，如我们期待的那样，隐藏在浅绿色书皮上仅有英译的简洁饰面，正是《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当天下午，我们都去聆听翻译者的第一场演讲，演讲者安斯科姆(G.E.M. Anscombe)小姐，也常被称呼为彼得·吉奇(Peter Geach)夫人，是维特根斯坦最喜欢的学生之一。集会在萨默维尔学院远郊的附属学院举行，要到那儿去，必须绕许多弯路。数以百计的学者，和不同年龄、精神面貌的猎奇者，沿着小路，步履匆匆，近乎奔跑，在角落到处乱窜，你推我搡，唯恐占不到座位，而比这更糟的则是错过演讲的开头。这样的场景实在令人印象深刻。彼得·赫布斯特(Peter Herbst)在我身边一边小跑，一边以他特有的机智说：“这可是在不折不扣地追求真理啊。”

安斯科姆小姐对书稿的翻译毫不满意，以至于不得不立即在《心灵》(*Mind*)发表了更正翻译错误的第一列表。在她看来，这些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在事实上“阻止了读者的理解”(Anscombe 1953: 521-2)。维特根斯坦在1951年逝世后，安斯科姆小姐聘请了多达七名翻译顾问(名字在卷首)，其中一些专家不仅通晓德语，还熟悉奥地利的方言用法。那天下午，她的演说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翻译错误，这必须由专家集体修订委员会经过复杂的过程一点点纠正；另一个则是(这方面至少部分地解释了她曾遇到的困难)她个人的一丝不苟，绝不对书中的观点作随意的附会。在安斯科姆小姐看来，后者是翻译工作的首要优势。至今，我的耳边依然回响着她强调这些观点时铿锵有力的话语，“维特根斯坦在一个地方所说的东西，不应该被与他从另外角度所说的东西横加关联”，或者其他大意如此的话。将这种夸张的警告与胡腾(Hutten)同样夸大的断言做一个比较将会很有趣：同年11月，胡腾(Hutten)在《不列颠科学哲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上所发表的一篇关于《哲学研究》的短评这样说道：“我们不需要在这些问题、及相关问题上无休止地绕圈子。相反，我们倾向于自由联想，尽管这种方法不太符合科学原则，但在某些用不着过于严谨、同时充满智慧的层面，比如当代的文学创作，自由联想还是派得上用场的。”(Hutten 1953:258)

对于既非德语也非英语的读者而言，对两种文本加以比较，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多少会让人有些困惑。人们开始怀疑，这些神圣的命题在两种语言中是否真能以同一方式阐述，进而得出同样结果的命题。“原则上，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陈述相同的命题，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例如用两个不同的句子。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否真的被严格设置为相同的命题，于是对句子中的差异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有时会被证明：认为这种区别并不总是合法的。”要么是由尊重、钦佩与感恩构成植被的语文学之山已经成为一只卑微的文学耗子，要么是英语就不能表现原文的活力和魅力，也就无法成功地获得智慧。至少安斯科姆小姐的印象如此，不过她肯定知道如何应付她高度敏感的同事们。例如，维特根斯坦对语言

的“使用”(Gebrauch)和“应用”(Verwendung)作了非理论化的区别:术语的“使用”比其“应用”更为稳定,“使用”遵循规则,而“应用”根据条件。在英语中,这两个术语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译作“使用”(use),而“应用”(application)一词只是毫无根据地偶尔出现。或者毫无必要地介绍想法,如德语“so schweben mir nicht neben dem sprachlichen Ausdruck noch‘Bedeutungen’vor”被翻译成“除了语词表达外,没有‘意义’穿过我的心灵”(1958:329)。更为严重的是某些结构性缺陷,例如,当“Befehlen, und nach Befehlen handeln”,显然应译为“命令与指令性行为”,如果被无端地描述式翻译为“发号施令和服从他们”,便失之牵强(1958:23)。

我的看法是,就口语而言,维特根斯坦的英语在教学中富于个人色彩,他成功地向听者传达了他的思想,不论他处理的问题多难,这种传达都是成功的;但是,当它写成书面形式时,这种思想的迷人与丰富程度就要逊色很多。它以母语写成的文章,都相对可理解并令人兴奋(也许意大利翻译也是如此,如果它足够出色)。但我的另一个看法是,维特根斯坦使用英语时,英语读者可能不太关心这些。关于安斯库姆小姐的犹豫和她此后的想法间产生了差异,读者应考虑这样两个奇怪的事实:1961年,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s)和麦吉尼斯(B. F. McGuinness)完成《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的翻译后,盎格鲁-撒克逊的哲学文化在已经在奥格登(C. K. Ogden)1922年草率而有缺陷的翻译版本中经过了39年滋养。之后的《哲学研究》和《数学基础原理》(*Bemerkungen über die Grundlagentheorie der Mathematik*) (追溯到1937至1944年,以及1956年),似乎一直没人有兴趣作进一步的翻译。1964年,布莱克威尔(Basil Blackwell)整理出了维特根斯坦三分之一未发表的作品,也仅以德文在《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 (可以追溯到1929-30年)发表。

在此,我觉得大卫·鲍尔(David Pole)的评论有所启示。鲍尔是后期维特根斯坦传记作者(他实际上几乎专攻《哲学研究》)。鲍尔首先复述了芬德利(J. N. Findlay)的观点,他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表达方式中始终保持着深切的黑格尔式的日耳曼共鸣。(芬德利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作者,成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专家前,他从事黑格尔研究并卓有建树。)鲍尔补充说,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令人感受到强大力量和探索欲,促使我们用心去面对大量原始手稿……维特根斯坦困扰我们,他的思想令人不安”;然而,当我们将维特根斯坦思想通过约翰工作成果传递给打了折扣英文版时——我们应该引用他的一个经典文章来描述这种感觉——“我们终于再次发现自己回到了家里”(Pole, 1958:103-4)。

甚至,《哲学研究》和其他维特根斯坦的书籍的标题,连德语都很少用——无论这种效应的产生是否由于护封的排版方式导致(一个弗雷格的译本,其中译者名字比作者更显眼,这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而当维特根斯坦被以德语引述时,几乎所有作者都因如下事实而抱怨——虽然他懂英语并以此在多年教学中取得巨大成功,但他固执地坚持以母语写作并留下大量手稿,它们现在必须被费力地翻译成可理解的英语。他为什么不直接用英文写作,从而避免这些额外的工作和误解。我不是讽刺,而是本着务实的态度。那时我的一位朋友表达他对维特根斯坦的激情和坚持正确的英语文化,是在“Unterzukúnghen”,或“Zukúnghen”的发音时,报以咯咯一笑或一个小媚眼的奖励。

无论如何,《哲学研究》的出现打破了此前原版《逻辑哲学论》(*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出版以来整整32年的沉寂(在这种情况下,G. E. 摩尔建议采用中性的拉丁书名,可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实用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这个名字已为人熟知。事实上,即便有两个例外,评论家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第一个是,“关于逻辑形式的一些评论”,写于1929年发表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但维特根斯坦却没有向会议宣读这个已经准备好的讲稿,讲稿主是关于数学

中的无限性问题。他原本是希望在会上以此讲稿一鸣惊人的；第二个是，1926年在维也纳出版的小学德语词汇表（虽然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编译这个词汇表的可能纯粹出于兴趣）。更为离奇的是，这些被称为《蓝皮书》和《棕皮书》的著名手册（最终在牛津由布莱克威尔于1958年出版）已经流传了多年却全然悄无声息，要知道学生和同事多年以来一直参加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课程并与其讨论，如果他们想要发表任何文字的话，做注释时肯定无法避免用到这些材料。这当中包括摩尔（G.E.Moore）、石里克（MoritzSchlick）、魏斯曼（FriedrichWaismann）和其他许多花了不少时间听课的人。早在1914年，摩尔就已经在挪威获得了维特根斯坦的真传，现在他与其他人一起出版了这些笔记（维特根斯坦，1961a）。相比之下，约翰·韦斯顿（JohnWisdom）则被一些人视为维特根斯坦最直接的追随者（他继赖特之后接任了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讲席），说起来他没有任何笔记，或者至少没有特别重要的笔记。1952年，他在《心灵》（*Mind*）发表了他从1934年到1937年参加的活动简要列表。一方面，“开启”了他与维特根斯坦关系；另一方面，旨在向公众强调这个深不可测的说法：如果我被要求用一句话回答“维特根斯坦对的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我将作如下反问“能在没有女王的情况下下国际象棋吗？”（Wisdom,1952:259）。

赖尔（GilbertRyle）则不以维特根斯坦的名义命名他的主要著作。维特根斯坦去世后，他于1949年出版了《论心灵》（*TheConceptofMind*）以纪念他。在BBC的采访中赖尔解释说，判断一个被当代出版界忽略三十年的人是困难的，他的思想迫使他保持一种“感想和解释，而不是一味追求第一手材料”。（Ryle, 1951: 7）

这些师生之间的不寻常关系，在当时最活跃的英国哲学家中造成了一种神经质的局面。由于太过受维特根斯坦口传灌输的影响，他们甚至无法独立撰述自己的思想。严格说来，当他们想出版时，不得不在维特根斯坦思想元素和将这些影响作为自己的表达之间做出选择。通常，他们通过一批对导师进行深度解读的笔记来解决这个两难。但是，诺曼·马尔科姆（NormanMalcolm）和赖特（G.H.vonWright）于1958年出版的传记散篇中却提到，维特根斯坦很反感这种努力，他感到自己被不断地误解和背叛（Malcolm, 1958）。尽管篇幅简短，但这两部文献却成了研究维特根斯坦的智识形成过程的传记最重要的来源，且几乎是唯一来源，我后面也将不断提到它们。考虑到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特别是在《哲学研究》中）和他的智识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探索他被神化的过程，并面向一个真实历史维度来重新发现他。这个过程并非对所有的思想家同样有效：这种方式确实对他们中很多人没什么用，相对于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智识文化生活显得不那么重要，或至多是在某些局部方面有所帮助。但对维特根斯坦而言，则是非常有用的，它们揭开了一些神秘面纱。因为，他令人迷惑的教学过程体现了欧洲文化最特殊的圈子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二战后的情况。而且，他迫使一整代哲学家失声无疑是另一种不小的成就。

但现在，这些文献就在这里。可以用导师本人的术语来检验或重述那些神圣的命题；并且，可以开始对他的影响进行回顾性分析。至少有两个方面是令许多学者失望的。首先，如前所说，在几乎未接触德文原稿的情况下，所有评论的关键工作都建立在译文的基础之上；其次，那些有幸从导师口中得知新学说，或曾通过英语哲学界的各个分支吸收成果的人，比那些第一次接触维特根斯坦学说的人会读到研究中更多或不同的东西。弟子们觉得，最重要的是不为外界的评价左右，那些评价或认为弟子们会看到更多，或至少夸大其词。多年来，我一直相信，后者的态度可能是由于与学术派别或难以说清的感情因素，加上有些学者的势利和吹毛求疵（这是维特根斯坦最憎恶的缺点）综合导致的结果；但如果我们想想，读一则简短的警句，和可能耗上整年时间来阅读的混乱译文是完全不同的。考虑到原创者本人且对教学如此热情地投入，我们就必须承认他的弟子们确实应具有某些解释的优先权。

例如《哲学研究》核心概念之一，“使用语言”就发生过这种误解。在该书出版后第一时间读到的人，倾向于只看到以一种给定的语言，一种习惯了字词的语言。由于习惯和使用机

制中的主题相对于各种自然语言来说是不断变化的，显然不能作为逻辑-哲学研究的基础。他们立即发现，激烈的批评将会令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派苦心经营起来的术语系统轰然倒塌[.....]。与此相反，那些曾与维特根斯坦本人或他较为出色的学生讨论过这个问题的人，以及熟悉该份文献出现的主题范围的人，就会认识到在这种语言使用概念中，只有在特定语言中，某些东西与由来已久的用法的部分重合。此外，还要将语言学家们所说的语言共时性纳入最基础的一般层次上考虑。这是我们用来表达自己的方式，是我们根据不同情况、不同需求进行交流的技巧。维特根斯坦的“行为”概念是以逻辑-结构为目标的，而非一个以历史或社会学描述为目标的语言概念。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弟子们对此有完全充分的研究。我赞同批评他们将研究与文化彼此割裂开来的做法(主要是从哲学史、语言学，及其他尤其是德语的哲学文化等其他学科的角度)。直到20世纪50年代，他们当中许多人仍在这样做。但是，即使从他们对概念的含糊、而不完备的使用来看，我们仍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方法论过度或贫瘠的焦虑：害怕推进一些过度严苛的理论结构，就像一个早产儿那样，过早确立了其自身内部极其复杂的结构，最终会阻碍而非有助于进一步的研究。

二、“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维特根斯坦

就理论体系而言，柏拉图有三个或四个阶段，黑格尔有五、六个阶段，谢林则有多达六、七个阶段。就目前而言，维特根斯坦的情况没有这么复杂：通常得出的区别是以《逻辑哲学论》为标志的“第一阶段”（或称前期维特根斯坦阶段）；以及《哲学研究》和其他遗稿构成的“第二阶段”，或称后期维特根斯坦。除此外，至多可将1929到1933年之间作为一个未被完全研究的一个过渡时期（他返回剑桥大学从事哲学研究），根据冯·赖特的说法，在这期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vonWright, inMalcolm, 1958）。

有必要对这一期间的变化做一个非常简要的回顾；通过比较《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就足够了，这两部作品代表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体系之大成。¹

在“第一阶段”，维特根斯坦的第一个老师是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罗素曾是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利（Bradley）的学生。但罗素拒绝后者的形而上学一元论，而继承了他对经验主义心理学的反拨，并反对他们忽视研究判断，进而反对他们基于某种自然主义意义，在一种思想的碎片上建构自己的研究的做法。最初，遇到罗素时的维特根斯坦的立场，既不是完全唯心主义，也不是完全的经验主义，而是一种被唯心主义逻辑丰富了的经验主义，它如同一个语言单元，伴随着一个完整的思想单位。休谟的遗产对哲学家的直接作用在于，对思想构成要素的分析，有人认为他的观念是一种原子论的观念。但是，与休谟及其后的经验主义者不同，哲学家们现在不得不应用分析加上形容词“逻辑的”指示来进行综合判断。罗素早在1914年提出了如下想法：问题在于到达“逻辑（而非物质材料）的原子”；但它们必须保持由判断构成的初始原子单元。并非所有的命题都是判断，它们本身在讨论下产生，从长远来看，这将导致注意力扩展到命题的所有层次，但一开始仍集中于命题中对科学最重要方面的那些陈述事实（陈述）。哲学领域的探索不同于语言学之于语言的建构。哲学关注言说结构本身，以及言说方式本身能够具有的意义。由此涌现出的一系列密切相关的差异走向了更深的层次，甚至超过了真理和谬误的区别：这种区别乃是意义有无之间的根本区别。

到目前为止，罗素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逻辑哲学论》除了检验恒真命题和概率，还对形式逻辑的技术做出了贡献，可以令人信服地从历史的角度来概括罗素的结论。维特根斯坦使用严格的形式化工具来研究每一个符号必须满足的条件。他也从命题开始解释本质并检验命题构成。一个命题类似于代表事物的图表，它包含多重符号，并在某种程度上按一定方式排列其中层次。符号的排列必须以一一对应的方式来反映世界的元素和结构：一个语句能断言某种事物的状态，因为它与所代表的对象具有同构性。但无法表达是否有意义这一根本差

¹ 很明显，讨论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演进过程，还需要研究他的遗作，包括那些还未公开的和各种笔记听课。

异。如果试图这样做，意味着在意义之有无之间作比较，这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换言之，对第一阶段维特根斯坦来说，不能被陈述的恰是陈述的一般结构，而它代表的事实则使得自我再现成为可能。该结构只能“显示”。因此，陈述（*aussagen*）与表现（*zeigen*）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维特根斯坦将其发展成为神谕般的著名学说，给《逻辑哲学论》的最后一部分平添了一种神秘的品质。对于语言意义的给予或否定，哲学家-逻辑学家只能表现而非陈述。哲学并非一门科学，也不能提出理论；它只能集中于表示所述内容的逻辑结构。

《逻辑哲学论》的陈述是实践性而非理论上的，在我看来，自然哲学虽然很多内容可能需要修正和放大，但必须在原则上接受这一说法。原因是，黑格尔体系解体后，否认哲学的现实性就意味着倒退至前康德时期的概念。然而，就其本体论基础而言，《逻辑哲学论》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于前康德时代的内容。现实乃是不可化约的事实构成，静立于主观思想之外，如置身亚里士多德的镜前；“事实上，一个图片要素[Bild]与其他元素彼此关联的方式，是以确定的方式表示以相同方式关联的事物”（Wittgenstein, 1961 b: 2.15）。维特根斯坦的这些论断没有涉及任何概念的发展，尤其是，历史-社会维度完全阙场。《逻辑哲学论》的世界仿佛一个静止的逻辑天堂，其中的思想反映了结构，一言定鼎，无须解释。²

当我们将视角从《逻辑哲学论》转换到《哲学研究》时，第一件触动我们的事，是两者之间的生命延续性（尽管并非历史意义上的）在语言表达层次的中断，所有的形式主义术语如今都被弃用：

比较多种语言工具（*Werkzeuge*）以及他们的使用方法、各种词句与结构（*Bau*）的逻辑将会十分有趣。（包括《逻辑哲学论》的作者。）（1958:23）

这种拒绝已经成为一个程式化过程，从抛弃所有框架以展示和陈述的对比开始。现在，分析是单指语言“情境”（即语言的语义要素），由此引发了一些哲学上的困难。从这些意义要素出发，从语言分析出每一个可能的方向，无论第一眼看上去是如何被安排的。沿着“语言是路径的迷宫”（1958: 203）的思路，分析者力求发现语言使用上的一些相似性。并非因为他们还原了一些形而上学的“共同财富”，而是因为他们最富于变化的途径中彼此关联，并通过这些关系，构成了各种各样的“家族”类型（1958: 65-67 ff）。因此，一个表达的功能，可以通过与其他不同表达方式对比而被勾勒出来，语境赋予意义以重要性（1958: 583），一切都必须在语境中观察。同时我们须警惕，超越多样而模糊语境由某个表述本身来引申一个普遍性陈述的做法，这种方式忽略对语境澄清和理解。哲学研究必须通过具体的例子，哲学家可以使词特殊的、反常的用法返回到日常的用法（1958: 116）。这并不意味着从难到易，而是恰恰相反。因为对哲学的语词使用，必须提防使其从语言的财富变成随意的抽象；虽然人们学说话时显然不需要学习全部词语之间的关系，但正是这些极其复杂的语词关系，构成了困扰哲学的迷障。

哲学问题与语言同样深奥和重要（1958: 111）。当“语言去度假”时，或当语言问题“闲置”（*leerläuft*）而不“工作”时，哲学就获得了发展（*Wenn die Sprache feiert*）（1958: 38, 132）。我们让自己被形式化的外部相似性愚弄，就会忽略了不同语言的内部功能差异；我们解释语言系统的某个部分时，只是通过错误的与其他部分语言类比来实现（1958: 90, 91, 109, 132, 304）；我们以单一类型的例子来滋养我们的思想，这种过于均匀的饮食是“哲学病的主要原因”（1958: 593。真正的发现将是一种“使我在想研究哲学时能停止的控制能力”（1958:

²对《逻辑哲学论》完整而正确的论述，现在或多或少都可以在当代哲学指南中找到。一个“经典”是温伯格（Weinberg 1936），因为它可以追溯到1936，因而未受第二阶段维特根斯坦的影响。

133; 斜体字标出)。

我们必须将句子视为一种手段, 并在此意义上处理其用法(1958:421)。一种语言是由许多部分构成的, 相对于工具, 每个部分都以其自身方式在所属的语境中运作(1958:11, 23; PartII: 224)。词语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1958: 43); 语言总体则是被我们兴趣所引导的手段(1958: 569, 570); “事物的表意背后是人”(1958:457); “口语或书面语言是人与人互动的桥梁”(1958:7, 9, 23, 25, etc.); “语言在语境中获得意义”(1958:583), 我们在公共语境中学习言说。“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1958:19)。

方法推进遇到困难时, 一个有用的办法是对比简单和复杂性的语言游戏或模型 (*Sprachspiele*) (1958:8 ff.), 它们可被作为研究手段要素, 例如: 可以作为比较对象 (*Vergleichsobjekte*)。这些模型通过语言要素间的相似和不同对比来澄清它们(1958:130)。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Sprachspiel) 来处理任何语言应用, 无论是人造的还是“自然的”, 包括语言使用和超语言行为——1958:7)。这意味着不仅要收集语言材料, 而且要在适当的形势下安排这些材料以显示问题的结构; 由此, 仅仅有材料不足以发现真正语言使用情况下的例子, 还需要造出其他要素 (cf. *ingeneral*, 1958:109-33)。

一旦我们从汇集各种形态的词句的倾向中解放出来 (1958:11, 122, 435, 661), 就能沿着这样的路径就能揭开那些无意义的伪装 (1958:464)。困难也由此敞开, 而我们则能够厘清问题所在。

维特根斯坦将哲学困难视为个人的难题或对个人的“心理的阻滞”, 可以通过意义疗法来治愈(1958:123, 255, 309 *passim*)。但他对这一难题背后的个人因素或环境原因却并不感兴趣, 对困难本身的分析以及它作为语言中的相对对象的体现也不感兴趣。这一过程不同于精确的心理分析过程, 因为困难是非个人化的, 且被视为一个人际间的交流结构(1958:109-129)。这可能是弗雷格逻辑主义遗产通过《逻辑哲学论》在《哲学研究》中留下的影响。因此, 判断后期维特根斯坦路径在何种程度上是否属于“心理学”是十分困难的。相反, 它是一个典型的结构主义路径。通过模拟(如巴尔特所说)对象的途径建构, 并在此过程中重建规则, 对象的操作在其中得以显示(Barthes, 1964: 213-20)。维特根斯坦拒绝本质主义, 他关心的是功能: 他削减语言中的碎片, 旨在寻求在变化无穷的口语中出现其他例子中可以测度的范例。他试着探索意义而非为对象指定意义, “他寻求发现意义如何可能, 以及在何种代价、何种依据上可能”(Barthes, 1964: 218)。如果词句的表达意义在于其具体的使用中, 则必然有一个规则控制这种使用(1958:199, 242)。这些规律必须符合公认标准, 即行为的社会方式。这里, 理解维特根斯坦拒绝本质主义的关键在于, 言说者(或听者)特定的私人经验赋予了表达以意义(1958:243 ff., 398 ff)。这一原理源自本体二元论, 出现于私人经验语言与公共对象语言以同一方式阐释的时候。实际上, 对特定词汇, 我们不能详述任何人的具身性行为。“我们所说的一种精神[*geistige*]活动与这些词汇相对应”(1958:36)。(注意: 这里并未否定私人经验或思维本身, 只是指出对它们一定程度上错误的解释方式 (1958:304-8, 654-5)。

另一方面, 将私人经验压缩到可观测行为当中, 是一种总体上的行为主义, 其并非从本体二元论的反思中得来, 而是对这种二元论的隐蔽的延续。总体行为主义论者也是二元论者, 他简单地拒绝讨论“内在”对象, 因为他并不承认其存在, 或由于他不能将它压缩为“外在”的语言对象。最初, 他面对二元论的两个术语, 从中选取看上去更为可行的一个, 但恰恰却在重新审视这种局面时, 却不关注其他术语(cf. 1958:308)。与此相对, 我们应该尊重支配私人经验的语言规则: 实际上, 语言游戏是多方面的, 它们不能彼此推演。然后我们会发现, 在任何情况下, 语言都不会是完全私有的。没有(单独)个人的专属语言, 因为语言意味着参与规则支配的社会活动, 这是私人的语言所不能实现的 (1958: 153, 202, 243 ff.)。语言中并不存在个体的思想伴随或附着: “当我用语言思想时, 没有额外的‘意义’通过心灵加诸词语的表达: 语言是其自身的载体”(1958:§329)。“思想……只是将话语区别于无思想的话语而

己”(1958:§330)，它们是在社会规则之上的区分。当然，也有可能通过行为来思考而无须诉诸语言；但对行动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情况中包含的任何思想的构成都是“一些必须伴随着语词过程，除非无思想就不能说话”（*ibid.*）。实际上，“一个‘内在过程’恰恰需要相适应的外在标准”（1958:§580）。

本文将提及《逻辑哲学论》中出现的其他要点。即是从这样的简述中，我们也能看到维特根斯坦如何从《逻辑哲学论》的本体实在论和逻辑主义转移到一种明显的唯物主义。一方面，体现在他拒绝将思想视为外在于语言、交流和行为的独立过程，同时，他注重将真实的人类环境要素纳入意义生成的考虑范围。

可以审慎地说，维特根斯坦开始在一个更小的尺度上来操作概念，这让人想起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发展——之后在一种非常精细的方式中发展出明确的概念。相对于费尔巴哈的精细演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只是顺便提及。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要说维特根斯坦比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更大：他在《逻辑哲学论》中，从固定结构的天堂出发，演绎出现实世界中千变万化的意义行为，并在严格的人类语言现实领域中探寻其迥异的形而上学源头。但是，他并未自问语言自身变异的根源，以及，为什么困扰与误解于是语言威胁的存在。这一点本文将最后将更清楚地说明。维特根斯坦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经验主义和生物学主义的，但绝不是已经检验的社会共同体的群体。在此，我们将看到对他工作未曾预计的阐释在此敞开。这并非偶然，本体论者伯格曼，曾是 20 世纪最后 20 年最有趣的哲学复古思潮代表之一（前维也纳学派成员，他现在自认为是恢复前康德形而上学的推动者），1961 他曾断言《逻辑哲学论》的“辉煌”和《哲学研究》的“拙劣”，其理由是后者是一种“荒谬的事实唯物主义”（Bergmann, 1964: 225–41）。

三、围绕维特根斯坦历史书写的真空

到底什么影响了维特根斯坦，让他的哲学体系与最初的《逻辑哲学论》如此不同，而且如此可接受和令人兴奋？在欧陆，这一问题听来相当合理。无论一个人曾经多么辉煌，也无论让他与世隔绝多久，肯定没人会相信有任何东西能代替自己头脑中的想法。维特根斯坦肯定也不倾向于夸大他所受到的影响，但他本人在《哲学研究》“序言”（*Vorwort*）（dated January 1945）中提到两个影响。此文值得重读：

当初沉迷哲学，而今再度回首，我被迫认识到 16 年前第一部书《逻辑哲学论》中写下的东西所犯下的重大错误。思想上经过与弗兰克·拉姆西（Ramsey）批评的遭遇，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到达了一个我自己几乎难以估计的程度——在他生命中最后两年，我与他曾无数次讨论问题。不仅如此，通过这些确定而有力的批评，我深深受惠于这所大学。例如，斯拉法先生，多年以来不停令我提升自己的思想，我受到此书中许多思想成果的激发。

(1958: x)

人们不禁会受到这些明确的线索的鼓励，人为应立即研究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形成，并为他的新思想在历史框架中的找到定位，以更完善的补充、界定其范围。不幸的是拉姆西英年早逝，在 1930 年 1 月，他 27 岁生日前的一个月去世了。他留给我们的全部著作是十篇思想犀利的数理逻辑论文。其中，包括两篇经济数学（J. M. Keynes 盛赞其文）方面的论文，以及三篇富有深刻洞见的书评，分别是关于：奥格登和瑞恰慈（Ogden and Richards）的《意义的意义》、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书评写于 1923 年，与作者讨论该书之前）。关于拉姆西与斯拉法（Sraffa）的影响，冯·赖特不无保留地说，拉姆西的批评对早期维特根斯坦观念具有重要作用。鲍尔（Pole）也提到拉姆西曾“告诉维特根斯坦，逻辑是一种规范科学”（Pole, 1958: 38 and 56n），但并未

提及斯拉法。赖特和马尔科姆在他们写的简要传记中（我常用的根据）都倾向于赋予这位意大利经济学家更重要的影响力。可能，这是从拉姆西以数理和形式逻辑作为主要技术的兴趣出发来理解的（尽管他确实如此，但在一个例子中他却尖锐批评维特根斯坦的学院主义倾向）。

首先，是斯拉法的尖锐有力的批评，迫使维特根斯坦放弃了他早期观点，并朝向新的道路出发。维特根斯坦曾说，他与斯拉法的讨论让他感到像一棵树的所有枝干都被砍掉了。这棵树要变绿，则有赖于其自身的生命力的重新焕发。

(vonWright, inMalcolm, 1958: 15 f.)

《逻辑哲学论》的中心思想，是一种图像论命题，正如赖特所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一战的战壕里，看到杂志中一张代表车祸事件所有可能结果的图表时出现的想法。该图像成为一个命题：即作为事件状态的一种描述。它通过图像部分和真实的事件对应获得这一功能。图纸充当一个命题：那就是，作为一个事物的状态的描述。它通过图像的现实中的部分和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获得这样的功能。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反推，人们可以说，以一个命题作为图像以其部件与现实世界之间建构起类比的对应：其中命题各部分联合的方式——结构——将代表一种现实世界元素组合的可能方式，即事物的可能状态。在以自己的方式陈述同一个情节之后，马尔科姆接着说，有一天，当维特根斯坦和斯拉法在火车上聊天之后，这个理论就“突然”破坏了。

当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一个命题与其所描述的对象必须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相同的“逻辑多样性”，斯拉法做了个手势，他用一只手的指尖扫过下巴，熟悉那不勒斯人的手势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厌恶或蔑视的意思。然后他问到：“那是什么样的逻辑形式？”斯拉法的例子令维特根斯坦对他所坚持的命题及其对必须有相同的“形式”的描述产生了一种荒谬的感觉。这打破了他原有的观念——一个命题必须与它所描述的现实是一种确切地构成“图像”关系。(Malcolm, 1958: 7-8)

由于担心可能与其他历史发展有关，尤其是担心对从《逻辑哲学论》的观念世界到《哲学研究》转向的分析过于主观，马尔科姆又增加了一个脚注：

赖特教授告诉我，维特根斯坦与这个偶然事件的关系有点不同：问题争议在于，维特根斯坦主张，每一个命题必须有一个“语法”，而斯拉法反问维特根斯坦何谓“语法”。冯·赖特在描述这一事件时，维特根斯坦没有提及“逻辑形式”或“逻辑多样性”。

(Malcolm, 1958: 69n)³

另外，语言游戏概念还受到足球游戏的启发。一个晴朗的日子，维特根斯坦正沿着球场散步，他突然闪现了一个想法“我们与词汇玩游戏”。（为了表明当时的情况，马尔科姆附上了一个插曲。他通过物理学家弗里曼·德莱森得知的，而后者的信息来自维特根斯坦本人。ibid.: 65。）

忽视这些事件的重要性显然不妥。毕竟，它们展示出一个思想家通过观察日常生活构思新的想法的过程。当然，这是因为他掌握了分布在不同“领域”各类行为中的一般方法。这对那些除了照本宣科就无法思考的头脑是一个有益的矫正。然而，有时人们的印象是，无论他的头脑中想到了什么，维特根斯坦只是轻松愉快地与朋友学生们相处，没有掩藏的动机，而

³ 1965年4月，我曾有机会和马尔科姆谈论斯拉法对维特根斯坦的可能影响；他对此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他只是回忆了火车上关于手势的这一幕插曲。

仅仅是关注一个玩笑的效果。基本上，他和他们一起发明了文字游戏理论，在他们对导师的崇拜从，接受了这一切。[...]

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融入了剑桥的环境，并通过剑桥进入了整个英语哲学文化圈，这绝非偶然。最初他去做罗素的学生，尽管反感英语，但他仍在英国找到了适合发展他的兴趣和想法的环境。当时，剑桥（牛津也是如此）完全是精英大学，淡泊欲望，并以斯多葛主义为主要传统。受此影响，他也准备以克制来面对琐碎的问题。

他的教学方式十分独特，从不组织讲座，而是穿插着长时间沉思的问答，还有他的那些古怪行为，正好契合了从伟大的 19 世纪自由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风格。这些风格又经过完善的分层的机制混合了个人主义的特质，这种社会结构虽然不再是帝国的中心，但仍然是英联邦的核心。这种理论上的个人主义对他的语言理论造成了限制（后面会谈到）。剑桥和牛津的高校习俗是，任何人都可以在理论上挺身而出，但是如果他所说的不符合集团价值观，在实践中他就被视为不名誉的个体。事实上，当时的思想主张是：每个群体应是一个自由的个体的组合，从而形成独立个人的联合体。但是，这种主张也被用来遮蔽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被预先判定为这样的群体，才会被“承认”属于他本来就已经身处的这个群体。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大学像牛津这样，允许其成员 20 年间不发表任何作品。英国各种学术朝着专业化发展，哲学从历史和社会科学分离，这也让维特根斯坦保持、或至少使他更易于保持处理问题时与历史-社会学维度截然不同的方式，也不同于以前那些常用来作为参考的导师（康德，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名字，他吝于写出引文。）基于个人的才华和原创能力，这种态度还是可容忍的，但后来逐渐变得令人反感，尤其是数百年轻小伙子就像康德一样，对他的使用的所属文章写一个片段，（*der*）而不是自己投入对《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思想的研究。后来，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几十年的摩尔（G. E. Moore），在这里创建了语言分析学派。

在维特根斯坦死后，相关史料编撰显得不足，必须承认，这种英国社会和学术环境的同质化特性，阻止或至少延迟了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更现代和在社会意义上更有趣的使用。据我所知，还没有人从历史的观点研究过这些，甚至没有人将其与更广泛的问题联系起来看待，或试图在维特根斯坦设定圈子外面尝试应用。粗略来看，可以说他们仍然保持着逻辑学的观念，但逻辑学极具穿透力，可能已经超越了维特根斯坦自己设置的领域。我并不是影射赖尔（Gilbert Ryle）、韦斯顿和许多其他没有做过的原创性工作的人，他们没有提出维特根斯坦的口头或书面教义之外的想法。但他们无疑继续了学术的“外部”历史，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将社会环境纳入考虑，他们也从来没有回到这些思想出现指出的伟大文化源流中来从事研究。最主要的观点在于：减少“第二阶段”维特根斯坦对现实历史维度的贡献，转而把它投入到建设性的使用中。这并不足以重建他本人心智发展历程以及与周围环境的个人关系。

我们还必须在欧洲文化的架构内作一个回溯，首先是系统有效地阐述后来属于他的观点、学说和技术，再独立地追踪它们对他个人的影响。他的学说自身已经完成前一个工作，不过只是偶尔的引用，而缺乏深入。（在一个晴朗日子，拉姆西对维特根斯坦说，“你知道吗？逻辑是规范科学！”），他们似乎不知道，后者的可能。[...] 他们可能高估了洛克传统所说的精神意识的相对于无意识的重要性，也高估了意识作为个体行动中心的位置。

实际上，即使作者并不知道之前界定，这一界定——如果它被证明是有效的——引起了进一步的研究，这一界定通过接触其他界定而被放大并接受批评。所有这些材料，都有助于在一个框架内所定位作者所说的内容，并检验它。以一些发展的缺席开始，代之以其他作者的相似想法。尽管存在直接影响的时候，这一切都更真实，但它永远也不能像许多盎格鲁-撒克逊哲学家们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乏味的材料和优先性的愚蠢主张。[.....]

[...][对这一切的忽略意味着]第二阶段维特根斯坦的活动不断被抛回第一阶段，这也削弱了对《逻辑哲学论》相比《哲学研究》的理论创新的评价。这加剧暴露了他的学生和追随

者的缺点，他们热衷肤浅而舒适的偶像崇拜，以日常语言舒适但不负责任地宣泄其崇拜狂热。这最后导致各种不同倾向的学者对他变得反感。比如，造成了提倡某些“先验逻辑的理性表达”主张，从他工作中某观点（所有观点都源于“语言作为蛊惑我们的心智的手段”——1958：109）提出了一些荒谬批评，他自己已经有效地表明它们是荒谬的。此外，它使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客观地看待他的哲学批评，作为语言病理学可以很好地在意识形态的一般批评中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这种复杂的局面的形成明显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史学真空和文化分离主义气氛中盎格鲁-撒克逊特殊而精细的品位；二是在欧洲各国滞后而肤浅的学院派哲学理论，加上某些众所周知的狭隘教条倾向，即使马克思主义者也长期以来深受祸害。

通过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新资本主义工具运用”，我们必须尝试从不同的方向接近维特根斯坦，坦承两个基本思路的局限，并通过他思想核心来还原思想的原貌，这比惯用的细枝末节的老生常谈和典型的官方化的“维特根斯坦”讲座要更接近他本意。

我感觉，我们必须自问，维特根斯坦和他的传记中被认为是最重要，和最富有成效的外部“刺激”是什么？我认为是斯拉法的刺激。斯拉法同样是一个天才，是一个经济学家，并碰巧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四、一个关于斯拉法影响的假说

为了说明斯拉法的现代性思想特质和他的工作性质，我想谈谈两位专家及其著作。一位是克劳迪奥·纳波莱奥尼（Claudio Napoleoni）和他的《新世纪经济思想》（*Pensiero economico del novecento* 1963），其中结论部分讨论了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他提出这是“第一次尝试，明确以现代方法的深刻不足之处为假设，自觉地阐述一种经济分析”（例如，主流的做法，是反对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所谓古典经济学，并从杰文斯、瓦尔拉斯和维克塞尔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的当代理论家出发展开分析），他对它的评价是一种“明确回归古典传统，回到李嘉图-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实质上与利润、工资和消费等上世纪那些主导的类别有所不同。斯拉法从事劳动价值理论以外的分析，从而使自己克服经典理论形式上的困难；他不从任何既定的社会结构出发，而是从“商品”的世界和“它的技术连接”入手，他发展了一种剩余理论，纳波莱奥尼认为，“它们必须带来回报，在经济学中也是如此，对剥削的整体问题，是古典传统中的基本问题”。

事实上，要处理……消费与生产关系的问题，势必要重新思考人的条件如何对应于一个剥削组织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异化的条件，这是马克思第一个看到的现代经济社会的相关知识。（Napoleoni, 1963: 194, 198, 201）

文森佐·维泰洛（Vincenzo Vitello）在他的《现代经济思想》（*Pensiero economico moderno*）结尾部分也对比了斯拉法的方法与“现代”理论的相似之处。在后者看来，“我们从原初生产要素开始，通过随着这种方向运动，最终到达商品消费阶段”（沃尔拉模型即是此种典型）；“以商品生产商品”是指社会生产的一个循环过程，其中同一商品既作为产品出现又在自身的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的手段。尽管斯拉法本人不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他提供了一个回归剩余价值的概念，该概念已经完全迷失在边际生产力理论中（Vitello, 1963: 124）。

我曾在1960年11月跟斯拉法讨论，当时他相当回避我的访谈主题。他倾向于尽量减少自己对“第二阶段”维特根斯坦智识的影响，他仅仅将两人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沿剑桥一起散步的善意而愉快的记忆。最后，他承认或者有些观念上的东西，并提到有可能自己写出来，我不知道他是否确实这样做了。需要在头脑中清楚《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之间的差异，并记住，斯拉法理论的主要命题早在1930年已经制定。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一个新李嘉图

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逻辑学家施加的影响略带形而上的专制主义色彩，同时神秘地开放了如下形式（或可能采取的形式）的衔接：

1. 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给定的总体性，回归到语境的关系中来，这是循环而非线性思维。具体而言，即回归到真实的环境中——包括构成语言的特定“事物”——获得它们的意义。真实语境之外的事物毫无意义，或让自己在先入为主且不属于他们的图式中被同化、贬值。这是《逻辑哲学论》的情况，其中每个命题都反映了一个由双方共同构成的事实。在今天，任何意义方式下都不可能谈论这个结构，我倾向于认为这种学说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相似性：每一种商品基于自有的属性，以不可约的方式有一个值，也可解释为利润是资本的固有属性。在《哲学研究》中，句子的内部结构是通过比较与其他句子而揭示的：即通过一个对句子增加外部结构的方式，组成由至少两个句子之间构成的关系。当维特根斯坦表明，单个词语的意义构成他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他制造了一个由内到外的类比过程。马克思分析商品与维特根斯坦分析词语至少具有如下共通点：都拒绝价值是对象内在属性的可能，而将它们置于特定语境中。

2. 回溯语境和真实情境中的词汇意义（更确切地说是：将它们变成话语），进一步回归到人类作为意义演绎者的存在。这种存在不仅是生物个体，更是公共社会生活的存在；相比较而言，主观的私人经验就是次要的。正如主观经济价值理论建立在一种近乎唯我论心理原子主义基础之上，所以也是一个主观的意义理论。毕竟，这一观点出现于《逻辑哲学论》Wittgenstein, 1961 b: 5. 6 ff.)⁴。商品“自身并不能无缘由的进入市场”，语词也是如此。这是商品和语词有共同的；这种价值是由人类在协作中授予他们；私人语言，如同私人市场，是一个有冲突的术语。但是这也有可能令个人既拥有的商品同时也能获得讯息。

3. 另一方面，商品或词汇可以回到现场承担人们赋予它的价值；因此，正如马克思在他对商品拜物教的知名的文章中所说，它反映人类自身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反映了它作为一种客观的特性附加到劳动产品本身，还反映了它作为这些东西的社会固有属性（Marx, 196 5: 71-8 3）。在斯拉法的认识影响维特根斯坦的马克思主义因素时，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些命题也适用于单词、句子和讯息。

4. 范例研究模型是古典经济思想的特点。这些模型通达抽象的途径，体现为丢弃次要特征，而不是汇集在一起的共同属性。这是一种抽象的方法，它决定了自己与对象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从它们所属的整体中切割出某些部分，而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工作路径。他不仅拒绝通过共同的属性归纳获得的任何模型，他建构的“语言游戏”即是通过丢弃无关或次要的内容形成独立全体。通过这种方式，他避免了危险，并通过“逐步细化类比”（莫里斯·多布的表达）对一般属性的进行概括，对具体问题的理解和接受检验中，原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变得不再不可或缺，因而在失去深度的同时获得了广度。⁵从一个与他自己不同观点出发，我们或许可以批评维特根斯坦自限于一个很小的模型（就像我们可以批评他的后继者没有系统地工作，以回到同样模型的基本观念中来）；但是，维特根斯坦的论证目标正是我所提到的那些；语言期待找到语言理论中的李嘉图和马克思（甚至可能是其亚当史密斯）。

除了我们规模的差异，斯拉法和维特根斯坦在他们的作品开始和接近问题时，有一个明显相似的程序。《以商品生产商品》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模型之上的。首先，有一个封闭的生产过程模型，其中商品具有生产手段和产品两种功能，每一种商品的数量生产相应数量的生产手段。另一个模式，是一个经济过程中盈余的出现，生产和复杂的生产手段令商品本身

⁴ 在维特根斯坦许多讨论的语言唯我论的篇章中，这一观点是出现在《逻辑哲学论》中是在 Hintikka(1958:88-91)和 Keyt(1963:3-15)篇章中。

⁵ 在道博的《经济科学的现代潮流》(Dobb1937)的第五章中，有对建构和使用模型富有启发的片段。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道博本人也曾经是圣三一学院的教员。另请参阅斯威齐“抽象的用途”(Sweezy 1940)的章节。

继续，但技术如今允许生产的商品数量等于或大于其作为生产手段的数量。斯拉法在他的论文开头评论到：

让我们考虑一个只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原始社会。商品是由独立的行业生产，或丰收后在市场中交换。让我们首先假设，只产生了两种商品——粮食和铁。两者都被使用了，一部分用以维持工作，其他用以作为生产手段——粮食种子和工具的形式铁。

(Sraffa, 1960: 1)

接着斯拉法谈到了他的第二个模型；随后从其他生产手段独立出来的劳动，从其他价格中建立工资。在《哲学研究》的第一页，维特根斯坦先介绍和批评了圣奥古斯丁的语言理论作为教条化的例子，紧接着他写道：

让我们想象一个语言，假设奥古斯丁给出的描述是正确的。语言是作为一个建造者 A 和助手之间的交流手段。A 是以石头来建造：有块、柱、梁和板。B 递给他石头，这其中 A 需要提供一个顺序。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使用的词语包含“块”、“柱”、“板”和“梁”的语言。A 叫出他们的称谓：而 B 将遵照他听到的指令行事。假设这是一种**完全原始的语言**[1958:2; italics are mine].....它驱散原始语种[Arten]语言学习和应用现象应用的迷雾，从中人们能命令一个清晰的目标视野并将词汇功能化。

(1958: 5)

再看一个更为深入的案例：让我们来看一个扩展的语言案例 (2)。除了“块”、“柱”等四个词汇之外，还可以让它包含一系列词汇作为店主在 (1) 中使用的数字符号，[在 (1) 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这样一个应用语言向某人发送包含购物信息指令的例子，给他一张写有“五个红苹果”的纸，然后看着纸描述店主的行为：奥古斯丁的理论不能解释这种行为。] 进而，让此处有两个单词，比如“有”或“这”（因为这大致表明了他们的意图），用一个指示性举动来建立联系。最后是一定数量的颜色的示例。A 给出命令如：“d-有-板子”。同时，他向助手展示了一个颜色示例，当他说“有”时，他指向建筑工地的场所。

(1958:8)

我不打算进一步阐述这些类比，但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我得谈到更多关于维特根斯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其他关系。

五、后期维特根斯坦的马克思主义应用

除了对符号逻辑的技术贡献（这里不作讨论）和他的哲学思考的实践性方法论之外，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具有实践哲学的应用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维特根斯坦彻底地批判和拒绝仅仅作为一个思想家。无论他的思想多么艰巨和深刻的，他依然会有“错误”。相比之下，我觉得后期维特根斯坦给我们上了迄今仍令人充满兴趣的一课。这里，首先需要做好马克思主义可能影响的分析，包括在经典文本中直接影响。但即使研究可能表明并没有这样的影响，或者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影响。我们仍然需要考虑到他们之间的明显相似，以及各种类似想法在不同方向的发展。比如，私人语言的想法曾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Deutsche Ideologie*) 的猛烈抨击，说它足以令人记住他们关于黑格尔的意识-语言-思想三元论的评论。具体是在此书开始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涉及历史和意识的形成两段：

语言与意识一样古老；语言是意识的实践，为他人而存在，因此这也是语言对我个人而言真正开始存在的原因；语言与意识产生于与其他人交往(Verkehr)的实际需要。在这个

非凡的著作中还有许多其他的页面,我想维特根斯坦都会热情地阅读[...]⁶ 我指的是,那些“成为”真正问题的有关哲学段落的页面,以及对这些操作的现有的“对世界存在思想的独立表达——作为存在世界的基础”,或资产阶级对“财富”在商业和个人意义的使用,即“商业关系和个人相互关系等的特征。(ibid.: 42, 53, 61)

但我更多的是指是题为“约翰启示录或‘新智慧的逻辑’”,以及“辩解的评论”这些篇章。前者包含对作者所称的并置和同义的批评。并置存在于将各种语言技巧的使用,为其设置一个等同化的中间术语,之后被放弃了——“私下欺骗性的思想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方法。同义在于考虑到“如果两个词语源上相关或相似的声音”然后他们“互相负责”,或用一个词不同的含义“根据需要首先在某种意义上,然后在考虑其他意义”。这种技术的应用也在其他事项之中。

通过使用其出现在生活实践或哲学思辨中的思辨性的含义,能将经验转化成为思辨关系,说出该思辨性段落的含义,然后表述出来。因此,他批评生活实践关系也用同一个词表示。(ibid.: 304)

我提到的另一章中,有两个段落值得注意:

对于哲学家来说,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从思维的世界落实到现实生活中。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而当哲学家赋予思想以独立存在的位置时,他们就不得不使语言也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其中思想以文字的形式获得内容。从思想到现实世界的问题转而成为从(其)语言落实为生活的问题.....哲学家将只有将他们的语言溶入日常语言,从中抽象,并承认它作为现实世界扭曲的语言,进而认识到,无论思想还是语言在其自身均不形成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ibid.: 503 and 503-4)

读者可以看看对这些概念的批评:如“自我和逻辑把戏在进步中的使用,从“不是我的财富”到“我的非财富”,与所有可能从它产生的形而上学的后果,在本章中关于“新神学”,以及在其他章的内容,如:寻找具有“魔法般优点”的词汇重新建立语言思想与现实生活的连接。马克思和(或)恩格斯这些篇章以及许多其他的篇章,对那些研究过维特根斯坦的人而言,成为一个巨大的惊喜。一般来说,现代语言分析潮流代表他们最先进的范例。在《哲学研究》中,一些观念及其表达方式都来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某些地方,人们几乎有这种印象——维特根斯坦正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辨哲学传统态度移植到另一个智慧星球,还包括和其逻辑技巧、它的术语使用以及对“实用”语言的脱离。当然,这并非维特根斯坦唯一可追溯的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指明其他的一些关系,能有助于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变。所以,后来的追溯可以说是在同一条路的反向行进,我们最终会发现,自己与维特根斯坦思想一道重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在这里,我必须有条件地顺便回忆一下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贡献,他将意义定义为“生活中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始于“意义从最简单的例子中出现”,这是一种对命题

⁶ 或者他是否确实读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个完整版本于1932年在柏林出版,当维特根斯坦即将经历冯赖特所描述的“深刻的改变”;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不大可能完全没有讨论它们;值得提醒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饶有兴趣地访问后维特根斯坦在此期间计划转移到苏联;但是,无所谓的冯赖特告诉我们,“部分原因是俄罗斯30年代中期的严苛条件”,使得维特根斯坦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

的理解方式(Dilthey, 1927: 232-6)。贯穿狄尔泰对待“生活的类别”的许多段落,有点维特根斯坦的味道,即是说,维特根斯坦文本中的许多段落有狄尔泰的味道。马尔科姆告诉我们,维特根斯坦的格言“表达仅生命之流中才具有意义”“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其中总结了很多他的哲学思想”。(Malcolm, 1958: 93)⁷

这里唤起了另一个明显汇聚点。根据缪勒(Max Müller)创建的比较神话学派(他1868年至1875年任牛津大学教授,并在世纪末直接用英语出版著作),必须诉诸于语言比较来把握自发表达的神话,这种自发表达是语言对自然现象普遍的个人幻化。当形容词应用于这种现象,它就从原来的含义中挣脱,并被设想为个人名义的神灵。令人惊奇的结果是,神话来自于被视为病态的语言。对于维特根斯坦,我们可以说,在同一个圈子里,他散布了哲学作为病态语言的学说:这种可能是因为思辨哲学被否定了:即,在一定意义上,哲学已经被削弱为神话。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如下步骤,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德国古典哲学的结论迷失于在这个叙述到行动削减过程中;并且在这种“损失”形成了新的保守思想。

当然,更多的篇幅应该用来讨论维特根斯坦与语言学的可能关系,以及与他之前某些对利希滕贝格有兴趣的哲学家的关系上;对赫尔德和洪堡我们没有任何线索。葛森韦勒倒是指出,维特根斯坦和弗里茨毛特纳(Weiler, 1958: 80-7)有一定的关联,在他的《语言批判的贡献》(*Beiträge zu einer Kritik der Sprache*) (1901-2, 再版数次),以及多处其他作品中,看到了语言的批判对哲学的解放和治疗作用;他反对理想语言的使用,提倡代之以多样性语言研究。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明确将自己的哲学与毛特纳(Mauthner)的语言批判哲学(Wittgenstein, 1961b: 4.0031)相区别,但《逻辑哲学论》之后,他的方向一定程度上回到了毛特纳语言批判的位置。除了毛特纳和从事语言研究的其他哲学家,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30甚至40年代的哲学家,都忍受从“第二阶段”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出发,通过寻找或交换重要支持元素来看待他。⁸例如,他们欣赏“意义作为使用”理论的解析能力,但感觉它不够充分,进而会发现比较这一理论与所谓“分析”理论非常有用,它试图通过进入其构成要素来解析意义,而这种理论仍被大多数语言学家高度重视。

我们无疑能感觉到,维特根斯坦的语境之间具有某种(他推崇的)家族像似特性。相关的观点如,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曾说,语言学价值在于语言作为一个系统,在于语言博弈游戏提供的模型种类及其使用。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论语言的多语言研究,和“由魏斯格贝尔(Leo Weisgerber)、特里尔(Jost Trier)和其他人在1930年左右开启的“语义场”研究,这种研究战后由恩斯特·罗西-兰迪逐渐发展起来(Rossi-Landi, 1972: 273, n. 35)。

再回到马克思主义,是时候对前面几页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给一个形式更明确边界限制了。最后,看看究竟在那里他做了他最富洞见的贡献。我将负面观点出发——以四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批评。为了便于陈述,我分开来说。

第一点,维特根斯坦具有“公共性”而不具有“社会性”。他的语言游戏需要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发生。他正确地批评了从一个人“当中”发生的神话的错误观点:语言必须是公开的,也即是主体间可控的;它甚至要求在“一个与自己交谈”时,都需要的“外部规则”。不过,这在公众场合发生时并未被视为社会性存在。维特根斯坦的立场与商品研究者相似,都将自己限于描述各类交易,而他承认同类型交换总是可以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其他人群中重复实现。我们知道所有这些人的存在,但他把他们作为已经形成的个人加以研究时,他们

⁷ “表达仅生命之流中才具有意义”,马尔科姆说,就他所知,没有在维特根斯坦的任何篇章中看到这样的格言。但维特根斯坦却宣称在某处写到过。[...]几乎同样的格言表述经常出现在《哲学研究》中。

⁸ 近年来,一些哲学家表达了对语言学的浓厚兴趣;语言学检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各种哈里斯或乔姆斯基的各种形式模仿。参看威尔斯和阿尔斯通的篇章(Rulon Wells and William P. Alston 1962: 697 - 708 and 709 - 20)。

开始互相交谈会发生什么。当他描述我们作为孩子牙牙学语的方式（幼儿园作为不可替代的语言学校这一广为人知的想法，饱含着维特根斯坦的热情），他通过孩子来向我们说明，孩子们是作为已经充分发展的个体来传达他们已经具有的语言技巧。

总之，维特根斯坦的想法似乎从来没有抓住，或者至少没有把握住的问题根本，是个人在社会性形成他们作为具体的个人。除其他事项外，*他们*已经开始彼此交谈。正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konomie*）1857-8（但大约1950年进入公众的视野，因此，在维特根斯坦之后）中，马克思写道，个人与语言的明显关系——

——是其作为一个人类社群的自然成员。语言作为个人的产品是荒谬的，[*isteinUnding*]。但也是一种属性——语言本身就像一种社群的产品，就像社群中存在的其他方面一样——因为它不言而喻地代表着公共的存在。（Marx, 1953: 390）⁹

第二点，语言使用概念关注已经存在的东西；例如，我们使用既定的词语，这是它的意义。儿童学会了一个新词，并第一次使用它，这一行为中有些东西已经超出了这个孩子自身的认知（因此，这一行为将迫使他以某种方式“看到一片世界”）。但是，这个词最初是如何生产的？不回答这个问题类似于不问刀是如何产生的，将词的含义等同于它的使用就好比解释刀的使用（这是它的意义）而不考虑刀匠（可怜的东西），也不考虑从我们的手中切开东西这一真实的社会过程。总之，为了陈述另一种观点，我要说，维特根斯坦缺乏劳动力价值的观念：即价值的特定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指语言对象——作为给定的语言劳动力的产物。从语言的对象出发，他只是向前而从来不会后退。因此，他认为交流的手段是既定和“自然”的；它们是一种免费提供的财富。他以重农主义者的角度来应用语言（后来赖尔在一系列论文对语言使用的角度转向重商主义）（Ryle, 1931-2; 1937-8; 1953; 1961; 1962）。需要顺便注意一个有趣的地方，在斯拉法的《以商品生产商品》中，劳动价值理论同样未充分展开。

第三点，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作为语言的疾病和缺陷，他坚持认为“去度假”和“空转的齿轮”造成了“心智的阻滞”和“困惑”。无疑这提出了令人吃惊的方面，如果它未在社会和劳动的使用中适应，那也将是失败的。维特根斯坦来自问的是，为什么语言去度假而空闲出来的齿轮会造成这些阻滞和困惑，以及它们是否有历史-社会的根源？维特根斯坦不断从语言的角度谴责哲学异化的各个方面，并通过详细步骤加以描述。对戏，我毫不犹豫地概括为语言的异化。但是，他并没有对他审查并抨击的现象做反复推敲，他也完全忽略了异化的一般原则。他的研究缺乏一种社会和历史理论根基。（我的这种批评与那些19世纪式的陈旧批判毫无共同点，他们批评维特根斯坦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一种焦虑，因为维特根斯坦声称的“专门的哲学语言游戏中”存在病理特征。维特根斯坦和这写批评者，这种游戏的想法是现在看来都是过时的，语言的病理特征也可能是悲剧性的，但那是另一回事；对它的补救措施肯定不是另一种“特殊的哲学语言游戏”。）

第四点，作为这一切的结果，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传统正在变得日益贫瘠。这是因为，拒绝可能唤起各种传统的理论建构，而只剩下脱离现实的残留。除了令人恼火的琐碎风格，温和的节奏与日常用语仍然反映了维特根斯坦学术传统与其他文化的孤立，与其他方式智识追求的哲学孤立，与博学的牛津剑桥之外世界的孤立。关于维特根斯坦每的讨论，听起来熟悉的气氛仍然是一群漠不关心实际问题的专家，而只是特定的术语的发言在主导，发言者看过某些深奥的书，且只属于一个特殊的小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语言以典型的维特根斯坦式检验去度假和闲置。他接着说：“我们说……”，“我们倾向于……”，“我们没有意识到……”，等等。为什么从来没有人为诘难他“我们”只能依据这些孤立分子解释，而

⁹ 不久前的英语版本中：一个孤立个体在土地上再也没有什么比他能说话之外的什么财富，当然，他也可以就像动物那样，仅依靠物质而活着（Marx, 1973:485）。

他们默认接受成为“我们”代表着以种“所有的人”可能的借口，这是真是一团糟！英语读者感觉他们的语言是自然的（毕竟维特根斯坦曾用它教学和交谈），缺乏对语言相对论的认识无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辅助作用。

总之，从这一点上并不难看出，维特根斯坦积极地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的显著性。维特根斯坦的立场是非机械唯物主义的，他不断地回到一个基本的观念——人作为表演所有的意义和沟通的演员。在这些过程的研究，他构建了准形式化模型：即，在低层次上构建模型，而不过分具体描述发生的内容，并在充分抽象的情况下避免陷入经验主义困境。这些模型与整个分析理念一起，我称为“结构性的”，其纠正了历史泛理性主义的某些偏颇，因为它们坚持的立场，意味着拒绝所有面对实际事物时不充分的模型。因此，我们在一个非形而上的维特根斯坦概念中重新评估“常量”——它代表一个可识别的结构，即使在很长时间内，其改变速度比其他可认知结构慢得多。我将尽可能展现其积极方面，比如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为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调解。如上面提到的，年轻时罗素曾以他的工作为基础。实际上，无论从古典（或“新古典”）经验主义的观点，还是从经典（或“新古典”）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逻辑哲学论》中包含的分析都难以想象。

但是，维特根斯坦的最重要的贡献仍然是他在语言异化方面，尤其是对语言哲学异化的批判。对于他的理论局限总体的严肃保留意见并不能遮蔽我们认识这一事实——即他确实开启了语言“异化”，虽然他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也许从来没有想过在此事的一般形式，但他确实在语言特定焦点的异化形式与语言学表现方面积累了大量精细的工作。当处置那些草率概括的牺牲品时，我们永远无法有足够的坚持，在语义阐述和严谨性方面达到维特根斯坦审阅大量细微难辨案例的水准。一个理解维特根斯坦的人不会再被大话糊弄，不会被逻辑的把戏和哲学家建构的伪科学结构愚弄，也不会被共通话语面临的阻滞、缺陷或本质的局限等困难所阻碍。

维特根斯坦提供了对异化语言的现象学批判卓越而不可替代的工具。无疑他的哲学由一些局限：比如，他的“公共”并非“社会的”；他的“(语言)使用未与劳动重新建立关联”，以及他的“分离主义让语言脱离历史现实”。一旦人们认识到他观念中的这些局限，那么他的哲学理论活动就是可接受并可以通过实践哲学加以精确地扩展，但这种活动不应再局限于个人，而是应直接进入社会。再如，维特根斯坦持续攻击的混乱和心智阻滞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不仅出现在他某些同事的头上，而是全世界的普遍问题。它们是极为重要的社会事实，而不是单独个体的紊乱；他们植根于历史，植根于我们的体制中并关涉具体利益，而不仅是不明“诱惑”或个体言说者的“倾向”。

因此，当我们比目前更深入一步，进入史料允许的维度，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么说——卡尔·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可能具有某方面的互补性。具体来说，马克思给出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而维特根斯坦精于语言阐述的应用。如果它的根本重要性不停留在语言“去度假”的具体事实，而是继承寻问背后的原因，那么任何想要让语言回到工作状态的人，都会发现，知其所以然与知其然同等重要。

本文原题为““Towards a Marxian Use of Wittgenstein”，最初于1966年末发表在意大利期刊《新评论》(Nuovi Argumenti)上，之后收录于罗西-兰迪1968年的专著《语言作为劳动与贸易的传统》(linguaggio come lavoro e come mercato)第一版中。以该版本为基础，作者自己作了英文翻译，1981年发表于尼日(J. Nyiri)主编的《奥地利哲学：研究与文本》(Austrian Philosophy: Studies and Texts)。



(罗西-兰迪与庞齐奥)